

重读恩格斯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

□ 陈名财

在马克思恩格斯留下的庞大文本系列中，书信这种文本表达坦率灵活、要点突出、针对性强，对于完整理解马克思主义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理论价值和政治价值。在恩格斯众多的书信中，他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五封书信（1890年8月5日《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恩格斯致约瑟夫·布洛赫》、1890年10月27日《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恩格斯致弗兰茨·梅林》、《恩格斯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是恩格斯书信中的辉煌篇章，是全面、准确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不可替代的文本。具体来说，这五封书信的理论价值突出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强调经济因素“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在创立唯物史观时，马克思恩格斯侧重于揭示被种种意识形态所掩盖的历史的发源地和本质，得出了“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经济因素对社会历史发展具有决定作用，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结论。在这五封书信中，恩格斯把经济因素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精确地表述为“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一方面强调了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是所有其他因素中终极性、根源性的因素，坚持了唯物史观；另一方面强调经济因素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经济的决定性作用是通过许多中介和环节间接性实现的，批判了把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当作经济唯物主义的谬论。

二是强调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历史进程的作用是一种反作用，可以加速和延缓历史的进程。为了说清楚“反作用”是一种什么样的作用，恩格斯区别了唯物史观的“内容方面”和“形式方面”。“内容方面”就是唯物史观基本的观念内容，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形式方面”是指上层建筑诸因素产生的方式和方法。也就是说，政治、哲学、宗教等上层建筑决定历史斗争的具体形式，决定社会变革的具体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具体内容，但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结底是决定性的，“形式”上的决定作用受

制于经济的最终决定性作用。恩格斯还对这种现象作出进一步解释，社会分工产生了一个个具有自身内在规律的独立的劳动过程和社会领域。法律一经产生，内部就必须和谐一致，并披上正义的外衣；每种意识形态自身的发展需要以前人留下的思想材料为基础，这使得意识形态发展与经济发展具有不平衡性。

三是把经济因素和上层建筑本身都看作是一个复杂系统。唯物史观创立时，马克思主要是在狭义上理解经济关系，在这五封书信中，恩格斯则主要是从广义上考察经济关系，恩格斯把“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 and 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都看作是经济关系，这样技术、地理环境、种族和一定社会的外部环境、先前经济发展状况等都属于经济关系的范畴。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都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复杂系统。作为复杂系统的经济关系各因素之间、上层建筑各领域之间、经济关系各因素与上层建筑各领域之间相互作用，构成一个交互作用的复杂巨系统。恩格斯还进一步用这些众多因素的相互作用来说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历史发展中的诸多因素相互作用，使得历史事件只能以偶然的形式发生，但这些偶然性背后又隐藏着必然性，经济运动是这众多因素中“归根到底”的决定性因素，生产力又是经济因素中“归根到底”的决定性因素。恩格斯用两个“归根到底”，既坚持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又阐明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复杂关系。

四是强调主观和客观在历史发展中的辩证关系。在回答历史的动力和原因时，恩格斯运用辩证思维，阐明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历史唯物主义从现实的生活出发，认为物质生活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由此承认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是客观存在。恩格斯认为，这一规律并不否认个人意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每一个人都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通过无数个人有意识的活动得到实现，越是伟大的人物，对历史的影响就越大，但个人不可能改

变历史，无数个人意识相互作用，产生出一个历史的合力，这个合力为经济必然性所决定，体现出历史的规律性。

五是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意义。恩格斯强调要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研究社会历史问题的指南，不能当作套语和标签，简单化、教条化、庸俗化。恩格斯在五封书信中，充分发挥了马克思主义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恩格斯坚持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抽象出的历史规律性，达到理性自觉后，他又善于用规律性来具体分析诸多历史因素相互作用产生的历史现象，揭示历史事件的全貌。例如，恩格斯从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分析挪威和德国的小市民不同的特征及其成因，分析经济上落后的德国何以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分析产品贸易、金融贸易一旦独立产生后如何具有自身相对独立的运动方式，等等。总之，恩格斯用具体到抽象的方法坚持了唯物史观，用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克服了教条主义，使马克思主义更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

六是强调革命策略的与时俱进。恩格斯作为革命导师，不仅追求理论的彻底性，而且一经获得理论上的认识，就用来指导革命实践。例如，恩格斯把唯物史观作为研究工作的指南，分析当时欧洲革命形势发生的新变化。19世纪后期，自由资本主义已开始向帝国资本主义过渡，欧洲许多国家成立的马克思主义性质政党获得了合法性，拥有了选举权，有可能利用议会等合法手段进行斗争。面对新形势，恩格斯极力主张，当斗争的主客观环境变化后，各国要从具体情况出发，制定革命纲领和策略；当缺乏革命和立即夺取政权的条件时，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就不能再高唱为了笔直的革命道路“拿下障碍物”、马上发动革命的高调，而应该储备革命力量准备迎接将来的斗争。

重读经典

王国维以一位纯粹学者的身份居于那个动荡的时代，一生教人无数，著作等身，潜心研究文章之事，亦怀民族之大义。在治学成就上，他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学术巨子，以开放包容的心态，世界性的格局纵横古今中外；他淡泊名利，追求真理，坚守治学的君子气质。所谓君子气质是指治学应如君子“不为利来，不为利往”，坚持“和而不同”，善于“审时度势，顺势而为”。王国维一生“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以高尚的品格、宽广的胸怀、卓绝的智慧来阐释治学的君子气质，实践自己的家国情怀。

治学“不为利来，不为利往”

王国维治学只求真理而不为手段。王国维在《近年之学术界》中写道：“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他反对治学的功利主义倾向，坚持以追求真理为纯粹目的。

“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是王国维先生治学的初衷，在他看来治学应在“求知”而不在“求用”。王国维治学自觉地坚守学术本质，坚决将功利主义排除于学术追求之外。他自修哲学，将西方哲学“形而上”的哲学思辨引入国内，纠正国人对传统文化“形而下”的过分推崇，力图重塑国人对学术“形而上”的追求，恢复学术的独立、纯粹地位。王国维反对当时的人们借宣传“西学”的口号来达到自己的现实目的，在他看来治学应是人们思想领域的精神追求，需超越于功利主义，反对将其视为实现现实目的的附庸和工

具。他认为当时引入国内的18世纪法国自然主义之所以出现“波涛沸渭”的盛况，是因为“附和此说者，非出于知识，而出于情意。彼等于是自然主义之根本思想，固懵无所知，聊借其枝叶之语，以图遂其政治上之目的耳”。所以，从学术的角度看是“谓之无价值可也”。在王国维的治学理念中，思想交流的目的是让人们洞悉诸多思想的真正内涵，不是为达政治目的而断章取义，更不应把治学当成蒙蔽人们的手段。若以功利之心治学自会产生思想偏见，而不能领悟学术的真理。

王国维治学不为追名逐利，不畏权威共识，只求将以人为本的人性关怀重置于学术之中。他以固守学术本身为己任，以追求学术的超越价值为目标，以自由之意志摆脱各学偏见，力图将学术打造为一个纯粹的人文精神世界。

治学“和而不同”

王国维治学坚持“和而不同”的思想认识。王国维生活于清末民初时期，正值“西学东渐”大兴之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社会思潮已成为时代主流，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走入了二元对立的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王国维并没有盲目附和，他深入研究中西之学，发出了“学无新旧也，学无中西也，无有

用无用也”的醒世之声。王国维对中、西学术平等视之，坚持立足现实、以我为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科学扬弃精神。一方面，积极学习、传播西方的学术思想，在日本留学期间接触了康德、叔本华、尼采等西方哲学家的思想，回国后进一步研究了西方社会学、心理学、逻辑学等诸多学科，并发表《康德之哲学说》、《叔本华之遗传说》《尼采之教育观》《叔本华与尼采》等诸多著作及论文。他对西方文化的研究不是浅尝辄止，而是造诣精深，他对一些哲学概念和问题作了认真的辨析和梳理，力图让国人正确认识西方学术的本质，消除对西方学术的偏见。他为日本学者那珂通世、桑原骥藏所著的《支那通史》《东洋史要》撰序；应法国学者伯希和邀请洽谈中法学术合作事宜。另一方面，王国维注重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挖掘，他是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他的著作《人间词》和《人间词话》将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境界”从伦理学上升到了哲学，赋予中国传统文学更深的内涵。另外，王国维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他独创的“二重证据法”，为古史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确立了较为系统的近代标准和方法。

在王国维的眼中，学术无国界，无种族之分，他以开放、包容、豁达的心态对待各种学术差异。王国维治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总结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智慧，回顾党加强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建设的历程，总结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在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方面的经验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治理模式的深刻变革与演进，对于明确未来制度建设、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着力点和目标任务，有重要意义和价值。《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9年第12期特别策划“中国之治：传承与发展”系列文章，邀请专家学者撰文阐释。

在中国古代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治理观念传承与发展了中国传统的治理智慧，这些治理观念客观上规范和制约着历代王朝的治理过程并决定其基本走向。传统治理观念在哪些方面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治理过程？南开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孙晓春在《中国传统治理观念与社会治理实践》一文中指出，影响分三个方面：首先，儒家重教化而轻刑罚的治国方略，追求善治、善政而拒绝暴政，在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生活走向文明的发展路向；其次，古代思想家重视国家统一的治理观念，在客观上促使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了有利于国家统一的制度安排；再次，传统治理观念中的富强追求，为历代王朝的变法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支持。

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十三个坚持和完善”第一项内容。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要健全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组织制度，形成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体系。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有必要梳理党加强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建设的历史，以从中获得启示。中央党校（国家

□ 陈一东 甄夏

学坚持汲各学之可取，弃各学之障蔽，以君子“和而不同”之性将中西之学相互印证，认为新旧之学融会贯通，才是读书治学的根本方法。

治学“审时度势，顺势而为”

王国维虽以一个纯粹学者的身份自居，但他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究，与王国维书信来往极为密切的马衡评价他“不但是谈学问，尤其爱谈国内外的时事”。他虽不喜欢政治，但心系家国，胸怀责任，与“指天化地，规天下大计”的士子不同，他试图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来救贁国人的灵魂，重建人们的精神家园。

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中提出“于谓中西之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即开，相互推动”。他以卓绝的智慧认识到了中西之学的辩证联系，并且深知“风气即开”是大势所趋，治学应顺势而为。一方面，他认识到国人的落后现状，要想缩小中西之间的差距，国人应奋起直追学习西方先进的知识、思想。于是，在青年时期的王国维，力主弃科举，趋新学，不畏艰辛到国外学习“新学”思想，并在回国后及时翻译、解读国外著作，力图让国人了解到最准确的西方思想。另一方面，他也认识到国之复兴并不是盲目的追崇外来文化，国

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张大原在《党加强组织和领导制度建设的历史及启示》一文中指出，党的组织和领导制度变革的历史表明：只有在党中央的统一集中领导之下，党才能抓住历史机遇和时代主题，明确方向，大干、快干和实干，从而使党的事业快速稳妥地向前推进，从胜利走向胜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新中国工业化战略的抉择，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也积累了宝贵经验。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初步奠定和新中国工业化战略的开展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刘志光在《新中国工业化战略的抉择——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初步探索》一文中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重点体现在“一化三改”的大战略中。“一化”就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主体；“三改”即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中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规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展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党为了集中调配国家资源，实行赶超型现代化，从内部主要是农业筹集大量资金，推行公有制、国有化以及加速农业的集体化，这是一种制度创新的初步探索，在实践中孕育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最初模式。历史表明，国家和社会进步的关键是制度的完善和创新。通过改革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是重要的历史经验，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政治和制度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抉择，我国国家治理模式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革。这一深刻变革经历了哪些阶段，每一个阶段有什么特点？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副院长吴传毅在《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治理模式的演进：从“管”走向“治”》一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治理模式进行了深刻的变革，大致走过了从管控到管理到治理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改革开放初期，围绕经济建设这个重点和中心工作，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管控局面开始出现松动。第二个阶段：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

中国之治：传承与发展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9年第12期聚焦

□ 胡秀荣

市场主体地位的确立带来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第二次飞跃。政府单一治理模式开始被解构，代之以政府与市场的双重治理主体，经济型国家治理模式逐渐形成。第三个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积极探索现代国家治理模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定，明确了各领域的改革任务，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现代国家治理模式的逻辑愈发清晰。

多样性的尊重、治学时代性的把握，从更深层次上体现了王国维先生在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过程中的艰难探索。

时至今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节点上，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进程的不断加快，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已成常态，面对各国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态势，以王国维为代表的老一辈学人为中国文化的建设提供了智慧支撑、作出了学术表率。因此，倡导王国维治学的君子气质对建设新时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学习好、继承好、发展好优秀传统文化，以文化的纯粹价值为出发点，深度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厚内涵，坚持立足现实、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注入新的活力。其次，在面对外来文化时我们要深刻认识到中华文化强大包容性，“和而不同”，既要有世界性的眼光，又要有海纳百川的大国气度。我们既要研究又要借鉴，不仅要通，而且要精，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洋为中用的科学扬弃精神，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吸收外来优秀文化。最后，文化建设要“与时俱进，顺势而为”，过去先进的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的不等于永远先进，我们要具备创新精神，保持中国文化的先进性，让中国文化具备时代色彩，既能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贡献本土智慧，又能为世界文明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